

流亡之路

追求真理之路 从少年到青年

从晚清到1949年，这是中国大地上的一连串真实的故事。这是流亡之路和爱国主义之路。

刘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刘晋：男，1925年3月生于山东省烟台市。

1942年日寇占领烟台后，为了抗日投奔抗日后方，经安徽、河南、陕南，到达四川绵阳国民六中。

1944年至1946年读高中期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任自治会会长。

1947年到达晋冀鲁豫北方大学，任学生总会主席。

1948年8月调中央团校第一期学习，并留校工作，任班主任、指导教师、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直至“文革”前夕。

1966年至1974年被关“牛棚”三年，干校五年。

1975年至1987年调农业部，任宣传处长，农业部党校副校长、书记。

1987年离休后任国务院扶贫办顾问，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中心顾问。

序

热爱国家的先锋，热爱民主的战士

张 黎 群

《流亡之路》出版问世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作者刘晋就是从敌战区(沦陷区)向抗战大后方行进的青年学生群中的一员。他坚持写日记，将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青少年们的思想、言论、行为，如实地记录下来。久而久之便积累起如此珍贵的活生生的资料，从而形成了这部具有较高价值的反映抗战时期一群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和勇敢锐进的史书。

20世纪30年代的青少年，是置身于激荡风云的天地中的一代，是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地的中坚力量。生于斯长于斯受教于斯的热血青年，根据自己切身的体验，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把政治选择放在共产党方面，把爱国救亡解放中国的

希望寄托在共产党方面。这部书就是描述那个时代的一群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他们自觉地投奔到抗日的旗帜下，以身报国，以身许国，练就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赤诚爱国之心。

在那艰苦的年代，青少年们在实现自己的每一个目标中，都要付出莫大的艰辛，要一点一滴地去争取，鼓起勇气，跋山涉水，尽管到达目的地了，美好的憧憬又被活生生的丑恶现实所粉碎。于是，又产生一个新的希望，不折不扣地向前冲刺，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取得胜利，进入各级学校，受到正规教育，获得日后贡献国家的知识技能，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何等的来之不易啊！这部书，就是真实地反映了这批觉醒的青少年们，自愿与共产党同甘苦、共患难，并且把中国的前途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正确选择，对于当时的广大青年起着一种导向的影响！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革命事业中的骨干，迄今还起着积极的作用。

作者和他所撰写的那代年轻人，是同龄人，加之又是我的工作对象，我十分了解他们，可谓知音，因为，那时，我正是共产党专职的青年工作者。今天读了这本书，昔日情景又历历在目。感谢作者为我们当代青年、广大读者提供的高营养价值的精神食粮。

遥远而未过时的故事

燕 凌

《流亡之路》诉说的是 60 年前到 50 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连串真实的故事。那是 1937 年到 1947 年之间，作者 13 岁到 23 岁，从少年到青年，从抗日战争初期到人民解放战争初期，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作者个人的命运都处于波涛汹涌之中的伟大的历史时代。从中可以看到，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是怎样血肉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要在荆棘丛生、风雨如晦的大地上寻找和开辟一条走向美好和光明的出路，需要怎样坚定的意志、顽强的追求和不屈不挠的奋斗。作者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在黑暗势力迫害下连中学也未能读完，可是他在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的激励下，完成了他的有中国特色的 20 世纪 40 年代的《我的大学》。

这条流亡之路，是爱国主义之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坚决不愿在日寇的刺刀尖下当亡国奴，孤身一人跌跌撞撞、冒死

闯关投奔抗日大后方，一心一意为了求知识、学本领，好赶走侵略者，为建设祖国效劳。好不容易穿过日本兵的封锁线，刚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就挨了当头一棒，受到拒绝、欺骗、压制、申斥、侮辱、剥夺以至关禁闭、罚劳役；好不容易进了一所简陋的兵营式的战时中学，不久又是国军在日军进攻面前仓皇大撤退，学校宣布解散，无奈地又走上艰苦的流亡之路。在同河南人民共同经历了水、旱、蝗、汤的大灾大难之后，又在四川目睹了身受国民党党、政、军、宪、特的无可救药的腐败和蛮横无理的暴虐。这样的“国”值得爱吗？他和他的伙伴们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正因为热爱祖国，所以非改造这个国家不可！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下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这条流亡之路，是追求真理之路。在这条路上，他自始至终不断地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一辈子究竟应该怎样生活？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公理？他遭遇了人世间的种种不平，从不气馁，在“漫漫其修远兮”的道路上不断地“上下而求索”；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在广泛地了解社会和深入地体验生活的基础上，一旦接触到科学的、进步的理论，哪怕只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思想便豁然开朗，看到真理之光在闪耀，指引着自己和伙伴们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与其说是共产党单方面用力把他们引到了解放区，还不如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实行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把他们赶到了这新的天地。作者的真实经历充分说明，真正的革命思想，不是任何外力可以强加和灌输的，而是人们的生活本身内在的种种因素

合乎规律的发展,再加上合乎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予以指引的结果。

这条流亡之路,是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从渤海边的烟台,到东海边的上海,从上海到南京转皖北宿县碰到日寇清乡扫荡而折回上海。在上海流浪了一段时间再去宿县,闯过封锁线到阜阳。阜阳的学校不收留,又奔到临泉和安徽、河南交界的界首。被国军招生机构接受后,被当作苦力使用在黄泛区沿大沙河逆流拉纤到河南漯河,然后同国民党地方政府抓来的瘦骨嶙峋的民夫一起赶着牛车,缓缓穿过因严重旱灾而十室九空的中原农村大地,到叶县进了战时中学。不久,豫西战局吃紧,又有大片国土沦陷,他们流浪到河南、湖北边境的淅川。其中几十个流亡的孩子肩背行李,脚穿草鞋,翻山越岭,忍饥挨饿,到湖北郢阳,逆汉江而行,经历种种艰险,到了陕南,有的病倒了,有的被艰苦吓倒了,另谋出路,最后只有6人到达川北,进入设在绵阳的国立六中。经过两年多的苦熬、苦学、苦斗,得到了党的指引,认清了前进方向。在这期间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但是,国民党统治区仍然阴云密布。他受到反动势力接二连三的折磨和迫害,最后摆脱特务追捕逃到西安,筹划去晋冀鲁豫解放区。过风陵渡到运城,过不去封锁线,不得不折回西安。得到信息可以到北平找关系进解放区,就打算到徐州北上。到郑州往东火车客运停止了,就冒险步行走过中牟黄泛区2里多长的简易桥,到了开封。再往东,蒋军进攻解放区的战事正紧,又不能通行。折回郑州,南下经汉口到上海,从海上绕到青岛,经天津去北平,由地下党的同

志引路，再过天津，靠机智加上买路钱穿过封锁线。碰了这么多钉子，绕了这么大圈子，终于进入解放区，到了久已向往的北方大学。

在这漫长的曲折的流亡之路上，有荆棘也有鲜花，有乌云也有阳光，有血泪也有欢笑，有屈辱也有豪放，有坏蛋也有好人，有背叛也有侠义，有怨恨也有爱情……大社会和大自然，客观世界和人的心灵，都是复杂多样的。但归根到底，真善美必然要战胜假恶丑，合乎历史潮流的必然要超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从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虽然也有过迷茫和困惑，但没有为一时一事的困扰而停止前进，眼光总是向着前方，心胸总是向着人民。对于在艰险困难中或大或小帮助过他的一切人，他一一谨记在心头。对于在某种情况下或多或少伤害过他的一些人，只要不是死敌，他都予以谅解，不多计较；甚至在其中某些人后来遭遇不幸的时候，他还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且，人是会变化的，当年做了某些不妥或不好的事情，并不说明一生如何。在这本书里，为了遵守符合历史真实的原则，有些事情不能不如实叙述；但出于上述的考虑，作者把有些人的原名隐去。这也是与人为善吧。

这条流亡之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道路，它距离今天的时代的确是很遥远了。但这遥远的路却是今天的青年和少年不可不知道的。再遥远，它与现在我们脚下正在走的路也是相通相连的。现在的青少年有不少人不能理解，今天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当年究竟为什么要参加革命，甚至以为是当年的革命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推迟了。这本书

有助于回答这样的疑问。人们看了这本书自然就会思索：在那样残暴的帝国主义和蛮横专制而腐败透顶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统治下，不起来反抗行吗？不革那种社会制度的命行吗？看看这本书，可以从具体生动的形象和情节中了解，50年前的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从平原到深山，是一幅幅怎样的图画。山川固然不乏美景，人心固然不乏善良，可是侵略者和反动统治者在美景上肆意涂抹了太多的污秽，给善良的人们制造了太多的灾难。特别是把这本书里写的淮北农村和中原大地的景象同今天那里的变化对比一下，就更能明白50年前的革命和20年来的改革对于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看看这本书，还可以知道，50年前的中国青少年，想要求学求知，想要做点合乎自己愿望的事情，想要过几天稍微安定一点的日子，是多么难。看看这本书，还可以懂得，在艰苦险恶的环境里，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最可贵的情操，什么是最纯洁的爱情。

非常难得的是，这本书是根据作者当年在最艰苦的境遇中也要坚持写下来的日记整理而成，不少段落是原样抄自当年的日记。这就使这本书能够写得细致生动而又极其真实，连细节也是“原汁原味”。他在临到解放区之前，为了避免过封锁线时被搜查的危险，不能不把这些日记托人妥善保存。我们作为读者，不能不感谢冒着危险，尽力保护这些对反动统治大不敬的日记的那个女孩子。她是作者在绵阳六中时候的同学和朋友，不但在他极其艰苦的时候给他以种种无私的帮助，而且在作者从西安动身去解放区的最后时刻，在“与君一

别，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会的时候，突然十分平静地对他说出来“我等着你”这千钧重的四个字，主动地把纯真的爱情交付给他。她深深地为这些日记所感动，无保留地接受了作者的思想、为人和行动的影响。不久，她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了地下党，很快就做了支部书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她和本书作者同在团中央工作。自然，成为恩爱夫妻。在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里，日子仍然很不平静，他们仍然风雨同舟，共济时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过去以后，她做了《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不幸，在5年前，她过早地告别了人世。

我在读到这本书稿之前，与作者无缘相识。但我与作者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也是流亡在四川的青年学生，抗战初期，我也在中原大地上流浪过，在四川我也参加过南方局领导下的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也在那里参加过筹办和编辑学生报纸，抗战胜利后也仍然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也是在内战全面爆发后到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当时我所熟识并共同工作的战友，很多是在绵阳国立六中学习和战斗过的。只不过我比作者早到四川两年，上的是大学。我熟识的在六中读过书的学生，也比作者早若干届。我正是通过他们介绍，同南方局青年组取得联系的。也正是当年南方局领导我们开展青年运动的张黎群同志，读到刘晋同志的这部书稿，非常赞赏，热情地介绍给我，我才有机会在它出版之前先睹为快。主要是书稿写得好，也由于有共同的经历和感受，我越看越激动，几天不停，很快就看完了。在阅读中间，

不时不能控制地流下热泪来。看完之后，更陷入沉思之中，久久不能自己。

我衷心地向一切喜欢读书的人们推荐这本用生命的汁液写成的纪实之作。我还相信，即使是不大热中于读书的一些人，只要翻开这本书浏览一两章之后，也会被它吸引着继续看下去。没有经历过那遥远时代的世事的青年和中年朋友，你们就不想知道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从半个世纪以前的坎坷的路上走过来的吗？

应当做点说明的是，为了严格遵守真实记录的原则，作者记叙当年的事件和当时的见解，都保持着原貌，没有按照今天的看法加以改变。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当年的思想和行动完全是正确的。我们这一代人当时都很年轻，未免天真而幼稚，也未免受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例如，当时我们认为，苏联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是支持中国革命的，就一切都是无私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也保留着从旧俄延续下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因之也就不相信苏联出兵东北后会干出侵害中国利益、欺负中国人民的事情。这就使我们在反动派发动反苏游行时，陷于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地位，吃了大亏。还有，我们当时的想法是那么简单，认为只要革命一胜利，就一切都会非常美好，不知道在具有特别深长的封建主义传统、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国度里，改造这个国家和社会，实现富强、民主、康乐的现代化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自强不息的奋斗，还会经历很长的曲折崎岖的道路。结束了流亡之路，找到了“归宿”，只是新的路程的开始。

此后几十年间的经历，与流亡之路上的奔波受难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新旧社会相比有质的不同。但正像我们这一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新的路程上，时而欢乐，时而痛苦，有时甚至面临灭顶之灾。“文化大革命”时期，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大量复活，更是原先未曾料到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受了不少折磨，而他依然不改初衷，昂然前行。幸逢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壮志初酬，老有所为。为了解除一些地区农民的贫困，至今他还在远程奔波，从中也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看清了把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现代化的、各方面都无愧于社会主义称号的国家，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希望他把这几十年间，在这新的路程上的丰富而曲折的体验，再写一本像《流亡之路》一样真实而生动的书。那对我们这一代人和后来者，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第一章 追 求

一、失 学

天低云浓，细雨霏霏，似烟似雾。山东省烟台市笼罩在一片绵绵秋雨中。

那是1939年的秋天，我，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悲伤地离开了敬爱的母校——烟台崇正中学。

崇正中学是烟台市一所天主教教会中学，教师水平高，校舍、教室、运动场都很讲究，学生升入大学比例高，在烟台较有名气。尤其在1938年日寇占领烟台后，几所市立中学都派有日寇教官，进行奴化教育，而这所天主教办的教会学校拒日寇教官于门外，因此是烟台爱国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

我是1938年以考分第一进入这所学校的。

我热爱我的母校，但却不得不办理退学手续。我失学了。

头天晚上，母亲含着泪对我说：“孩子，妈对不起你，家里供不起你再读书了。你父亲失业后去了天津，一年多音信全无，家中能卖的东西也都卖完了，粮也吃不了几天了，你得想办法谋事

挣饭吃。”

我听后如五雷轰顶，一下子像是掉进地狱中去。

15岁的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打击，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现实。

“不，不，我要读书！妈妈，我要读书啊！”

我哭了一夜，妈妈也陪着我哭了一夜。

早上，我饭也没吃，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去了学校。等我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我用留恋的眼光看了一遍我熟悉的学校。尖尖直立在校门口的教堂，宽广的体育场，还有从教室里发出的朗朗的读书声……可这一切都与我无缘了，我立即要离开我敬爱的母校。我不得不到社会上去谋生，去挣饭吃。

办好离校手续，我一个人默默地出了校门。门外是大海。平时那宽广无垠的大海，这时也被细雨笼罩着。雨濛濛的，海朦朦的……

我顺着海边马路往烟台山下走。这条路是我从家里上学时的必经之路，走过千百次。那时走起来脚步是那样轻松；现在脚步是那样沉重。“失学了，要到社会上谋生，自己挣饭吃”，这压得我几乎抬不起脚步。

走到烟台山脚下，我的脚步再也挪不动了。我不想回家。我从马路走到烟台山脚下，从沙滩走到石蹦堆。这也是我熟悉的地方，每次放学回家都和几个同学到这蹦堆中捉小鱼和小虾子，可今天，我没有了这种心情，看到什么都是灰色的。

我找到一处平坦的石蹦坐下来，呆呆地愣在那里。开始，恼人的“到社会谋事挣饭吃”还重重地压在我心头；后来，思想变为一片空白，只是低头抱着双腿无奈地坐着，麻木地坐着……

时间从我身边飞逝，突然一阵轮船的呜呜长鸣声把我惊醒。

我抬起头来，看到前方绵绵的雨雾中隐约出现一艘船向海边驶来。近了，近了，看清楚了，是一条银灰色日寇军舰。一看到军舰上挂着的那血腥的红膏药旗，我心中就迸出一阵憎恶和仇恨。是它，引领着一群群野兽，把我们富饶美丽的国土，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都践踏得一片凄凉；是它，引领着一群群强盗，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烧杀掳掠，欺压和侮辱我们的同胞；是它，要把我们祖国疆土一片片变成殖民地，把我们中华儿女一个个沦为亡国奴。耻辱啊！

我一下子又活过来了，又有了思想，有了感情。我愤怒，我仇恨，两眼充满怒火。

“志冲，志冲！”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喊我，但我没有回头。

“志冲，怎么坐在这里，没有去上学，衣服都湿了。”

我回过头来，是她，张莎。上小学时我在振华小学，她在育德小学，这是两所姊妹小学。上中学时，我在崇正中学，她在崇德女校，又是姊妹学校。多年来，虽相识，还一起在抗日宣传中同台演出过，但只是在去年冬天一次偶然的说过一次话。今天，为什么在我这种不幸的日子里遇到她？

“放学回家，我走到这里，看到你呆呆坐着一动不动。难道你在这里坐一天了吗？你怎么啦，你说话呀！”

“让我说什么呢？我只能告诉你，我离开学校了，不能读书了，我失学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家贫，爹妈供不了我上学，让我自己谋生挣钱吃。”

“怎么，不读书了，自己去谋生？”她瞪着一双惊诧的眼睛。

“现在我只有服从命运，我和你们不一样。”

“不，不，我去想办法。我去找我爹，我家有钱，叫他帮你。”

“不行，我不要别人恩赐，我要靠自己。”

一阵秋风吹来，落叶在细雨中飘零。

二、抗日风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天津，直下济南，全国在危难中。烟台教育界、工商界及爱国人士纷纷发起抗日活动。振华小学和育德小学也在爱国人士张敬塘校长的带领下，由教师、学生共同组成了宣传队、演出队、募捐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

我参加了宣传队，在老师带领下写标语，散传单，在街头演讲，教老百姓唱歌，领大伙儿喊口号。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我们流着眼泪高歌大喊，听众流着眼泪同声应和，烟台市各界人民汇集成一股抗日的洪流。

我还参加了演出队。

一天，任老师，也是演出队的导演，把我叫到办公室。“志冲同学，现在要排演一出抗日剧《最后一滴血》，想让你参加。”

“我行吗？老师。”我睁大了眼睛兴奋地问。

“其他角色都选好了，只有一个角色选来选去都找不到合适的人，演出队最后一致意见，请你来演最合适。”

剧情是这样的，“一个被日寇占领的城市中一个教师家庭，父母因为抗日被日军杀害了，姐妹两人参加了地下抗日活动，给城外抗日游击队送情报。后来，姐姐也被日寇捉住杀害了，妹妹摆脱汉奸的追踪把情报送到抗日游击队手上，并领着抗日游击

队进攻城里的日寇。虽然这次进攻取得了胜利，歼灭了大量日军，但妹妹却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我被导演任老师叙述的剧情深深感动了，屋里其他老师和同学也都被感动了，一时间谁都不说一句话。

沉默了一会儿，导演任老师开口说：“志冲同学，请你来就是让你演《最后一滴血》中的妹妹——一个爱国的女中学生。”

“我？让我男扮女装演一个女中学生，这怎么行？”我着急地分辩着。

“我们不是没选过，让女老师饰姐姐，可以，饰妹妹年纪太大；让女同学饰妹妹吧，又显得太小，个子矮，不够老练。所以决定让你来反串……”导演任老师耐心地解释说。

任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有文才，又是我的级任老师，很受我的尊敬，可这一次说什么我也不同意。这不仅是能不能演好的问题，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去扮演一个女学生，同学们会怎么看，还不取笑我吗？

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急得流出了眼泪。

张敬塘校长进屋里来了。他坐在我身边，一面用手帕给我擦眼泪，一面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孩子，别哭，你实在不愿意演这个角色，不为难你，只是这个戏就演不成了。市里要开各界抗日动员大会，指定我们教育界排演这个剧本，时间紧，选不到合适的人演这个角色……”校长停顿了一会，用询问的眼光问导演任老师：“你们看怎么办？我们只有向市里报告说这出戏我们学校排不了，请市里让别的学校演出这台戏吧！”

我蓦地站起来：“校长，老师，我演，我演！”

屋里所有老师、同学都把眼光集中在我身上，沉默了片刻，大家鼓起掌来。张敬塘校长拉着我的手笑了。